

历史中的理论建构

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变迁

武卉昕

【内容提要】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变迁呈现出完整的逻辑脉络，它缘起于列宁逝世后有关道路问题的争论并强行统一了思想，并为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解释提供了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化的实践范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变迁的线索，这一线索沿非理性的逻辑路径展开，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思维”指导下，终结了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本身。

【关键词】历史理论 苏联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化 客观 主观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7) 01-0066-0007

列宁逝世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仍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围绕着列宁主义的本质、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工业化等问题的争论，以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展开的系列争论的核心，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问题。

一、围绕道路问题的理论争论

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俄国仍处于向“布尔什维克方案”过渡的时期，当时俄国的社会政治思想仍呈现变动的混沌状态，某种坚定的指挥棒式的指导思想尚未清晰呈现，而国家建设又急需这样的思想，因为这一指挥思想的终极指向，是国家的发展道路。“不断革命理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分歧不仅存在于理论界，在现实中也已经出现。

托洛茨基总体上坚持“不断革命理论”。“不

断革命理论”是托洛茨基革命理论的总观点，其基本要点有三：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具有不间断性；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具有不间断性；一国革命到国际革命的进程具有不间断性。在上述总观点和基本观点的支配下，具体应用到苏联的社会实践领域即表现为在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选择问题上观点鲜明地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一个无产阶级由于进行了民主革命而掌握了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结底就不仅仅和不单是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而更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的发展”^①。托洛茨基认为，脱离了国际主义的民族救世主义完全行不通，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摆脱对外部的依赖，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页。

【作者简介】武卉昕，哲学博士，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苏俄伦理道德观的历史演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项目编号：13BZX085）阶段性成果。

斯大林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持在理论上逻辑地传承了列宁有关革命“一国胜利论”，列宁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失去在多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利用矛盾特殊性原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斯大林遵循了列宁对矛盾特殊性方法的运用，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情况和苏联民族国家本身的实际需要出发，论述了战后苏联对“一国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的可能。斯大林的基本观点表现在：1. 国家会长期存在并一直存续到共产主义时代；2.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民族（苏联）国家不可能消亡；3. 正确发挥无产阶级在国家组织建设中的作用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保证。

在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耶夫“不断革命论”的批判中，斯大林建立起较为成熟的“一国革命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建构起“民族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制止了季、托等人用“不断革命论”为引导中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

同时，对“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也是争论的关键。对“工业化道路”选择的分歧是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争论的最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在党的经济政策方面的实际分析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①双方立场鲜明，布哈林的方案是：农业生产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杠杆，应全力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斯大林坚持迅速发展国家的工业，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斯大林立场的出发点在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国民经济独立于资本主义的包围，这样就要“彻底地扭转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盈利的目的要服从于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的目的”^②，很显然，这里面渗透了明确的政治导向：苏联要建设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属于苏联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突破资本主义的经济重围。

列宁逝世后，他的新经济政策理论面临实践拷问。很多人有新的担忧：容许私人资本存在的新经济政策是否会影响苏联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是否会妨碍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着派别之分。左倾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托洛茨基强力

主张“工业专政”、“超工业化”建设方案，即以保障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方式保障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以牺牲农业的途径发展工业以获得社会主义的大发展。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反对派维护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以实现社会经济平稳发展。俄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实际上认同了布哈林的方案，即仍坚持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最初方向——从工农联盟的角度出发，与人民群众一起前进。

无论是“不断革命理论”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分歧，还是对“工业化道路”选择的不同理解，抑或是对“新经济政策”理论延续与否的不同认识，全部争论的核心都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国家道路模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传承与创新的问题。对于问题本身的理论认识和应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更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趋向。因而，全部最初的理论争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斯大林在争论中斗争，甚至采取打击的手段，最后强行统一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看法，为20世纪30年代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舆论准备，奠定理论前提。

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阐释

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末期争论最大结果是用斗争的手段统一了思想，这种思想统一为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再认识提供了可能。受理论认识能力的影响，斯大林本人代表的三四十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深度和认识广度上都有局限。在把握经典作家（包括列宁）的基本理论的同时，斯大林试图将原点理论与苏联国情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属于苏联的阐释。研究主要包括：

第一，关于辩证法。

斯大林在承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对辩证法进行了理论阐述，归纳总结了辩证的四个

^①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7页。

^② Елисеев А. Марксизм Сталина, 2015. 12. 24, <http://krasvremya.ru/marksizm-stalina/>

基本特征：1. 辩证法将自然界看成是相互联系的整体；2. 辩证法将自然界看成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3. 辩证法将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的、有规律的过程；4. 事物内在的矛盾是辩证法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在实践中辩证法有相应的运用：第一，在联系中理解事物和现象；第二，以运动和发展的眼光去观察理解事物和现象；第三，应将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过程；第四，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通过矛盾斗争实现的。在总结辩证法的特征和实践运用的基础上，斯大林将理论目光放置到社会历史层面，提出了将辩证法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及其具体实施和社会意义，强调了一切以实践、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重要性。又结合苏联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提醒人们，为避免在政治上犯错误，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要做革命者，不要做改良主义者；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关于唯物主义。

斯大林总结了与唯心主义截然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基本观点）：1. 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是物质的；2. 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存在；3. 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相应地，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大到社会历史领域，斯大林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 社会历史性；2. 社会存在具有第一性；3.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同样地，斯大林将唯物主义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指出在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应当遵循的原则：如，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以社会生活的发展规律为行动指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当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社会活动；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正确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新的社会思想理论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物质生活的改造。

第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斯大林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条件和社会精神生活发展矛盾的钥匙，在否定地理环境和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意义的基础上，斯大林总结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特征：1.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

决定力量；2. 社会生产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当中，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社会生产史；3.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是自发的客观运动过程。相应地，从现实考量出发，斯大林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应用方法和实现程度，如，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掌握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应当从生产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进行实践；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等。

可以说，斯大林是将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最基本理论观点来看待的。事实上，他力图建立起由这三者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在理论上承认这一体系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在内容上，斯大林用上述三个基本问题沟通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阶级性和世界观之间的联系，或者说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储备和行动指南。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重要基本观点之特征的基础上，将其拓展到社会历史领域，并与苏联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这种理论分析的本身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守；同时，斯大林的一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也具有理论独创意义，如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承认并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力，以及他的理论认识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历史观中表现出的逻辑上的一致关系。总体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问题的认识并没有偏离经典作家（包括列宁）的基本观点，并且在很多部分给予了理论阐释和内容上的充实。客观地说，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

当然，基于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斯大林的一些结论仍存在较明显的问题，例如，对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的认识在理论上流于肤浅，并呈现体系缺陷；在认识论领域轻视实践的决定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区别分析不够准确；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的评价高于客观事实，在相关的研究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动规律把握失准。在方法论上，仍存在理

论与实践背离,忽视矛盾的统一性,过分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轻视决定事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等。

三、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

从1939年3月的十八大到1952年的十九大,中间间隔了13年,当然战争和战后的恢复任务是重要原因,此外,党的生活秩序本身也出现了问题,“斯大林对党参与决策不感兴趣,他主要通过政府系统治理国家”^①。到了1952年,苏联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国家发展又一次处于拐点,苏联重新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事实上,战后的新时代开启了,十九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在十九大上,对苏联国内情况的分析是后来理论认识和实现行动的起点:1.苏联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2.认为苏联的体制是最好的形式;3.苏联要进行体制调整和改革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4.战争年代的经历证明了国家工业化总路线的正确性;5.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律;6.只要资本主义包围的态势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仍需加强;7.党在国内政策方面的任务以经济为主等。十九大将斯大林的理论上升至不可撼动的崇高位置,客观上加剧了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化理解,这些政策指导和理论解释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有系统的阐述。这本书旨在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规范化的同时,也通俗化了,这本书是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苏联式阐述,其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可以发展并运用这些规律,但不能改造它。政治经济学的大多数规律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作用,并不是长久存在的。苏维埃政权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但是也无力改变经济运行的规律。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商品生产。斯大林认为,不能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将二者混淆。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的条件下,

还必须保留商品生产。但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商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所有权的转移,所以不存在商品生产。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有限度地发挥作用。斯大林从价值规律的客观性角度出发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体现在商品流通和交换过程中,排除了价值规律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在这个方面起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②。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仍存在矛盾。因为生产资料由国家分配,国家持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企业只是生产资料的使用者。斯大林指出苏联生产关系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领导机构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协调二者的矛盾,使其不至于激化。

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阐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性认识,同时基本反映了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实际状态,也是苏联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前提。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基本上是当时的社会实践需求。但在目的上呈现出明确的主观倾向性和教条化特点,这种理论阐述存在着致命缺陷,否认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排除了价值规律在生产中的作用;虽然承认价值规律、商品生产还在一定范围存在于苏联经济中,或仍在苏联经济运行中发挥作用,但由于对前者的否定,实际上价值规律有限度的运行是不能成立的。这种理论总结已经违背了经济规律。

四、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进程

后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趋势渐明。原因在于:苏共二十大掀起反斯大林主义运

^①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② 同上,第475页。

动的海啸，苏联在一夜之间对斯大林及其主义的态度从顶礼膜拜转向猛烈抨击，认为斯大林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应当受到谴责；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应当受到尊重。此外，尊重人性的要求日益凸显。随着苏联人认识水平的提高，有关人和人的本质的思考成为苏联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对共产主义新人的培养要求，促使人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创造性和主体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人道主义化开端。

在学术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开始于学术著作对人道主义的理论接纳。1957年末，法国哲学家罗杰·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一书问世并在苏联出版，“终结使人非人的异化是哲学和社会革命的共同目的”^①也是此书的目的；许多苏联学者认为，此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和幸福等本质问题的观点，呈现出对人性的尊重，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极大地推动了人道主义思潮。А.Ф. 施什金在《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中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提升至共产主义道德最重要原则的位置上来，指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特征：现实性、代表劳动人民、反对压迫和剥削、体现人的尊严和对人的关怀。

在理论的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初步结合上^②。40—50年代，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进一步激发人民的劳动热情，鼓励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被突出出来。

1955年6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劳动所得的个人物质利益的保护问题，明确指出不重视劳动群众个人利益和要求的做法是错误的。Г.М. 加克在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及其结合》一文中开宗明义：“个人服从于社会条件下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结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③，并在总结利益的内涵、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和个人之间正确关系的途径。文章为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初步结合、为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

可以说，50年代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并决

定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具有新内涵。而关注人的利益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开端的最明显的实践标志。

第二，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人道主义化转向。

后斯大林时期，反斯大林崇拜始终是苏联学界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问题的绝对前提，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也持续需要对人的尊重，对个人积极性的激发；从6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从马克思对人的异化进行批判的角度开始对“人”、“人的价值”进行研究，为人道主义原则找寻理论依据。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它表明苏联马克思主义领域对“人”的问题的部分研究已经悄然从政治层面进入学理层面。马恩相关著作的陆续出版发行与各界学者的系统研究使得苏联学者对人的社会关系、人的异化、人的价值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论证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苏联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批判中比较两种人道主义原则的不同，指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客观性、现实性、历史性。

在相应的理论储备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开始将目光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的视角转向单纯的对个人问题的研究了。他们把“个人”、“个性”单独提了出来给予特别的强调，“个人”变成了独立的话题。1962年3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强调：实现共产主义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基础，而且需要成熟的人。从此之后，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问题越来越吸引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注意，1965年《哲学问题》第1期的开篇文章就是《人是最高价值》，这里明确了“人”的基本特征：有理性，拥有权利和义务，具有行为活动能力，拥有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保持对他人的尊重。

在理论研究中人的价值被特殊强调，苏共新党章还把“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人是最重要的价值”的

① Марксистский гуманизм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1958, С. 170.

② 集体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等概念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内没有明确的区分，相当多的时候，它们是同义的。

③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и лич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их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при социализме // Вопрос философии. Г. М. Гак: М., 1955. С. 17.

理论提供了政策支持。“人道主义（гуманизм）”成为“显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人道主义化展开。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迁，对人的重视不断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趋势日渐明显，到70年代中期苏联学者对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理论认识落在具体问题的研究当中变得不大理性了，人道主义作为学术偏好愈演愈烈。人道主义化在70年代变成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赫鲁晓夫时代，铲除斯大林主义、告别斯大林及其主义无疑是五六十年代人道主义呼声日渐高涨的直接原因，这一原因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和政治操纵意味。在人道主义化延绵发展的30多年间，一些其他原因，也促使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化的发展，如对西方人本主义理论的接纳；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培养新人的要求；科学技术进步引发的人道呼唤；根植于俄罗斯民族思想中的人道主义传统等。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人性”概念被当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范畴被毫不隐讳地呈现了。学者们从世界观、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心理学等各个角度来解读“人性”。

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的人道主义化是现实政策下的理论研究趋向，它作为一条线索铺设了后斯大林时代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路径。它的实质在于：逐渐偏离了先前理论研究纯粹的阶级立场，逐渐放弃了核心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念，逐渐摒弃了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逐渐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具体导向抽象，逐渐引领了某种非共产主义追求的理论方向。这些结论在80年代后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

五、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思维”

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表面上无所建树，实际在内部发生着剧烈的较力，是理论剧变前的准备和酝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呈现如下特点：学术争论多，理论定论少，研究更反映社会政治生活变化。虽然嘈杂混乱，但不可或缺，因为它是剧变的中间过程。

接下来，理论剧变开始了。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剧变虽处处以“新”为题目和形式，譬如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问题和新解释，还有“新思维”。事实上，此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却伴随国家政治制度的蜕变和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正在急剧地向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轨道转变。苏联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反思，反思表现为“纠错”和创新。但这种反思热潮在后来愈演愈烈，并且发展成为极端的批判——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甚至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创新”是在全然摒弃从前认识基础上的创新，新内容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似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脱离了关系。它们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了。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剧变过程中，政治上的“新思维”起了关键作用。“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主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对新时期提出的“新”的政治思维，基本理念包括：改革是彻底的变革；“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价值观上倒向西方。可以看出，“新思维”是对苏联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颠覆，其结果会导致社会制度的改弦更张。一旦“新思维”的构想成为现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崩溃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抽离了阶级性和历史性的“新思维”代替了在苏联传承发展70余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历史终结。

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变迁呈现的逻辑脉络：缘起于列宁逝世后有关道路问题的争论，争论统一了思想，并为三四十年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划定了范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化的实践范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沿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变迁的历史线索展开，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思维”指导下，终结了历史理论视野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本身。

（责任编辑 靳会新）

Transition of Soviet Union's Marxis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ories

Wu Huixin

Abstract: There is a logic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 of Soviet Union's Marxis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ories. It originated from the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s of the path after Lenin's death and unified the ideology in a forced way; it also provided a possibility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basis problems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Explorations into socialist economic law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realized the practice paradigm of sovietizing Marxist theory. Marxist humanitarianization was the clue of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of Soviet Union's Marxist theory; this clue extended along a non-rational logic path, and finally terminated Soviet Union's Marxism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ori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new thinking".

Keywords: history theories; Soviet Marxism; Humanitarianization;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Внесение изменен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

У Хойси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Во влиянии те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логическая нить, которая возникла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из дискуссий о проблеме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послужила оправданием для насильственной унификации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а также да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ня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доктрины 30-40-х гг. XX столетия. Поис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законов социализма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достиг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превращ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в совет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Гуманизация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мысли – это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зменений при зарождении те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и этот ключ раскрывает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ый логический путь, который,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в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и, привел к завершению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марксизма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марксизм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оветский марксизм; гуманизм; объективный; субъективный